

博物館與文化 第7期 頁127~137 (2014年6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7 : 127~137 (June, 2014)

書評 Book Review

揭露隱匿傷痛，有多困難？：

評《難解知識的策展：公共空間裡的暴力過去》¹

Lehrer, E., Milton, C. & Patterson, M. (Eds)

Curating Difficult Knowledge: Violent Pasts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ISBN-10: 0230296726

ISBN-13: 978-0230296725, 240 pp.

鄭邦彥²

Pang-Yen Cheng

楔子：多重歧義的"Difficult Knowledge"

2009年蒙特婁 Concordia 大學舉辦“Curating Difficult Knowledge: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2011年，Erica Lehrer、Cynthia E.

¹ 筆者特別感謝兩位審查人，對拙文裡出現的諸多概念，不厭其煩且鉅細靡遺的提點指正。其中，有關“Difficult Knowledge”中譯，承蒙兩位審查人指正，再與劉婉珍教授、郭瑞坤博士討論後定案；再者，承蒙陳雪雲教授鼓勵撰寫書評，拙文始具雛型。以上種種，由衷敬表謝忱。惟文責當仍由筆者自負。

²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助理研究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Assistant registrar, Department of Registration and Conversatio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mail: pangyenc@gmail.com

(投稿日期：2014年4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年6月10日)

Milton 和 Monica Eileen Patterson 等 3 人共同編輯，將研討會中與「公共空間裡的暴力過去」有關部分論文集結成 *Curating Difficult Knowledge: Violent Pasts in Public Places* (《難解知識的策展：公共空間裡的暴力過去》，以下簡稱《難解知識的策展》) 一書，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為該公司「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系列叢書之一。起初，參考該研討會手冊以南非行動藝術家 Billy Mandindi 的“Hear No Evil, Speak No Evil, See No Evil (1994)”版畫創作為封面，畫面中有 3 位分別用手遮住耳朵、嘴巴、眼睛的人物半身肖像，將“Difficult Knowledge”暫譯為「噤言知識」，經審查人提醒該詞未能達意，再經徵詢思考，遂以「難解知識」中譯，冀以呈現關乎“Difficult Knowledge”的策展歷程及諸多面向的難解，並聚焦本書宗旨與關注議題。

“Difficult Knowledge”具有「噤言」、「受禁錮」、「難以表述」及「難解」等多重歧義意涵。該詞最初用於教育與心理學領域，Britzman (2000: 42)指出“Difficult Knowledge”背後隱藏了創傷歷史(traumatic histories)，為時人帶來特定的心理經驗與需求，持續影響，一旦其以抗拒或抵抗等形式外顯時，將啟動主體經驗的重整。創傷歷史往往被化約為被禁錮的知識，非但不能說、聽不見、看不到被禁錮，噤言成為禁忌，受主流歷史刻意迴避抹拭，最後變成被遺忘的故事、不能說的秘密。Lehrer 和 Milton (2011: 7)引言指出：“Difficult Knowledge”帶有「暴力、悲劇、陰森、令人恐懼和痛苦(violent, tragic, gruesome, horrific, and painful)」等特質，以致於透過策展表述此歷史經驗，顯得困難重重、處處難解。依 Britzman 論述，難解知識多半以抗拒或抵抗的姿態向時人展現，挑戰過往史識，透過策展揭露隱匿傷痛，將啟動主體經驗的重整；若未審慎面對，恐對特定觀眾和社群造成二次傷害，對其他社群產生漠視或無法同理的經驗。是故，博物館若有意再現創傷歷史，以策展解構被禁錮的知識，需找到合宜的媒介和詮釋觀點，將創傷歷史視覺化、化為被凝視的主體，同時避免為觀眾帶來非教育的博物館經驗，造成對立衝突，或使再現“Difficult Knowledge”不再困難(Difficult)難解。

再者，透過面對創傷歷史所產生的難解知識，不僅是建構的、辯證的，

更是「情境中知識(situational knowledge)」，重構「『人』如何『認識』世界」的新路徑，必得回到當時特定時空下被生產、詮釋和理解。《難解知識的策展》以 Lehrer 和 Milton 的「導論：由見證到目賭(Introduction: Witnesses to witnessing)」揭開序幕，下有 3 個單元，分別為「在博物館與社群之間承載見證(Bearing Witness between Museums and Communities)」、「將過去視覺化(Visualizing the Past)」與「物質性與記憶的挑戰(Materiality and Memorial Challenges)」，收錄世界各地博物館展覽個案與研究論文共 10 篇。最後，以 Roger I. Simon 的「轉向教育：一場針對難解知識策展實作的必要對話(Afterward: The turn to pedagogy: A needed conversation on the practice of curating difficult knowledge)」一文作為結論。借用 Morgan (1983)和 Lather (1986)對「知識(Knowledge)」的主張，Morgan 指出 1.知識是客觀世界的反映；2.知識是個體主動建構的過程；3.知識是主、客觀世界的聯合產品等三種不同假設，由此建構「知識是靜態的」、「知識是動態的」和「知識是辯證的」等不同知識觀，呈現「『人』如何『認識』世界」的多重管道；Lather 認為「知識從來不是價值中立，而是在特定歷史和情境脈絡下，根據時人與所處情境下所建構而成」的知識論上開展，提出「實踐取向研究派典(praxis-oriented research paradigm)」的基本主張。閱讀《難解知識的策展》一書時，如何回到個案背後的特定歷史和情境脈絡，並帶著「『策展』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視框，將有助於理解「難解知識」的多重歧義特質，進而領略該書精髓。

章節架構、簡介

綜觀《難解知識的策展》一書收錄個案，都是當代博物館與人權、社會運動團體的跨界合作策展，透過重新詮釋特定的歷史事件，冀以達到翻轉社會結構之意志力展現與實踐成果。於「在博物館與社群之間承載見證」單元，試圖闡述：為重構創傷歷史，博物館如何透過藏品與特定社群建立新關係的可能性、所該關懷的面向和創意；「將過去視覺化」單元，重點在看似結束

的禁錮歷史或進行中的噤言經驗，創傷歷史被揀選的策展實作歷程，特別是「『藝術』將過去視覺化」對觀眾的感染力、包容性和潛力；在「物質性與記憶的挑戰」單元，側重策展物件的物質性 vs. 記憶本質的流動性的辯證，面對國家認同和轉型正義，博物館如何借助「『策展』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特質，在創傷與記憶間創造新的橋樑，化解難解知識背後對不同族裔觀眾的張力和衝突，為當事者、觀眾及其社群帶來和解的可能。

於「在博物館與社群之間承載見證」單元，Igloliorte 的“‘We were so far away’: Exhibiting Inuit oral histories of residential schools”一文，指出「因紐特人」(Inuit)是居住在加拿大北方的原住民，為愛斯基摩人的一支，因 1830 年代原住民同化政策，迫使因紐特孩童離開原生家庭，進入寄宿學校，不只喪失了學習文化與語言的機會，多半曾遭受身心理的創傷與性虐待，2008 年加拿大政府為此公開道歉。Igloliorte 身為“‘We were so far away’: The Inuit experience of residential Schools”巡迴展策展人，分析自己與原生社群(source community)合作策展的協商歷程，譬如妥善照顧和保護 8 位策展參與者；在策展參與者、因紐特社群與觀眾之間，營造安全和受尊重的展覽氛圍；同時使用英文、法文和因紐特方言作為展覽文本等不同面向，使得這段系統性的暴力歷史不再沉默、隱晦，亦提供《難解知識的策展》具體實作案例。在“The past is a dangerous place: The museum as a safe haven”一文，Szekeres 以澳洲移民博物館(Australian Migration Museum)前任館長的身份回顧該館近廿年的策展經驗，重申過往將被官方視為危險的移民故事，如何被安全地再現於博物館場域之前提，在於建構博物館與社群間的互信合作關係。是故，無一展覽是遵循相同的策展歷程。惟有如此，館方與社群的策展對話始具意義，多半帶有情感的移民故事才有被訴說、被理解，最終影響並融入澳洲官方移民歷史的可能。

在「將過去視覺化」單元，Newbury 的“Living historically through photograph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Reflections on Kliptown Museum, Soweto”一文指出，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雖是沉重往事(dark past)，Kliptown

Museum 嘗試透過影像將其轉化為當下民主的臨在(democratic present)。此時，這些曾遭受壓迫與被不正義的對待、身陷種族隔離之苦的群體影像，不再是受難者，搖身成為具歷史性的能動者(historical agents)，影像背後所承載的被禁錮知識，不再是不可言說的夢魘，為觀眾提供了重回過去並與歷史和解的機會，內蘊包容性的國家認同。Katriel 的“Showing and telling: Photography exhibitions in Israeli discourses of dissent”一文，以伊朗社會運動團體 Shovrim Shtika 策劃的“Breaking the Silence”與 Machsom Watch 的“Endless Checkpoints”兩展覽為例，透過在伊朗與巴基斯坦軍事邊界服役軍人的現身說法，譴責伊朗主流社會對占領邊界的沉默和否認，促使異議論述的被公開訴說(sayables)。此兩展覽銘刻了當下，作為未來對過去想像，亦成為歷史紀錄的一部分。Mosely 的“Visualizing apartheid: Re-framing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through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n art”一文，討論南非當代藝術家如何透過藝術的感性形式，重新框架官方種族隔離的霸權記憶，創造觀眾協商對話的平台，藉此說明替代性「製作記憶(memory-making)」具有複雜、流動與無休止的特質，以及藝術作為將「過去」視覺化的潛力和重要性。

在「物質性與記憶的挑戰」單元，Milton 的“Defacing memory: (Un)tying Peru's memory knots”一文，提及祕魯政府為平息 1980 至 2000 年內戰，圍剿左翼共產黨游擊隊時，曾濫殺無辜農民，2001 年「祕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Comisión de la Verdad y Reconciliación, CVR, 英譯 The Peruvi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2003 年出版總結報告(Final Report)，2005 年藝術家 Lika Mutal 根據該報告創作了“Ojo Que LLora (英譯 The Eye that Cries)”的戶外裝置藝術。該作品是由近 32,000 顆石頭組成的迷宮，其中 26,000 石頭上寫有內戰罹難者的姓名、年齡和死亡或失蹤的日期，迷宮中央是一個象徵地母的黑色石頭。因罹難者中有 41 人是當時正在監獄受刑人，同列於 Mutal 的創作，導致 2007 年遭受人為破壞。作者 Milton 指出“Ojo Que LLora”雖作為展演記憶的場域(performative memorial site)，相對地「破壞」本身也是對過去的書寫，將記憶繩結再次緊束，構成人權敘事(human right narrative)的挑戰，使得公開討論更加困難。在“(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Jewish past in Poland's memoryscapes: Nationalism, religion and political economies of commemoration”一文，作者 Kapralski 以「記憶地景」(memoryscape)的概念，說明過去和記憶不是靜止不變的，相反是動態變動的，記憶地景是在現實生活行動中因應當代需求不斷建構的，並以波蘭東南部猶太人的記憶是如何被擦拭／再現和被保存／破壞為例，強調相同的過去在不同群體（猶太人與波蘭人）的認知、情境與政經利益下，可能產生相互競爭或衝突的記憶。

最後，Roger I. Simon 在「轉向教育：一場針對難解知識策展實作的必要對話」結論裡，指出：策展實踐時的另一個關鍵方法論。Simon 強調，難解知識的策展，無可避免的是一可能需要面對歷史敘事上的不確定性、甚至是衝突的情境，以及可能喚起某種程度上的焦慮、憤怒與失落，也隱含了策展人的價值判斷，有待辨識，因此提出「轉向教育(the turn to pedagogy)」的策展倡議，借用紀錄片「場面調度(mise- en-scène)」的概念，將被禁錮知識的「策展人」比喻為「導演」，視此類策展即為戲劇，所有舞臺上的演員、佈景、燈光、聲音等元素，悉由導演負責決定、指揮，不僅使之能夠有機結組，也為觀眾帶來「見證教育 (pedagogy of witness)」的啓示和經驗，成為難解知識之策展判斷(curatorial justification)的基礎，作為 Lehrer 和 Milton「導論：由見證到目睹」的回應。

策展、記憶與文化政治

《難解知識的策展》一書收錄策展個案，都是當代博物館與人權、社會運動團體的跨界合作策展，無疑開啓了博物館學的重要議題，提供面對難解知識策展時的可能參照、合作策略。同時，也可視為是西方當代博物館學界對 Nora 「記憶所繫之所(lieux de mémoire)」概念的實踐與反思（戴麗娟譯，2012），特別關注博物館如何有意識地透過策展重新詮釋特定的歷史事件，為當事者、觀眾及其社群帶來和解的可能。

記憶研究，開始於心理學學門，1925年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出版《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一書，1992年 Lewis A. Coser 編輯英譯出版《論集體記憶(On Collective Memory)》一書，依此著作，Halbwachs 將記憶研究範疇擴展至社會建構的面向。要言之，有別於個人記憶，群體記憶位於不同的社會框架中，透過群體成員分享記憶中被保留，產生強化、修正或變化，構成群體共享的集體記憶，群體的社會框架可以小如家庭，大至階級、性別或族群等，而個人往往同時處於多重的社會框架中，形構多元的個人身份與認同，此時，記憶不再僅是個人內在的心理狀態（江明親，2012：536-537）。1989年，Pierre Nora (1931-)提出「記憶所繫之處」概念的重要性在於：記憶必須有意識地透過物質性的外化策略被呈現和延續，如古物、古蹟、紀念碑、博物館、檔案文獻，以及週年性紀念、典禮、祭典與節慶等公共儀式，藉此促成記憶的展演與營造記憶的場域，當代將記憶外在客觀化的主流形式多半具有「紀念碑(monumental)」式特質，進一步將記憶研究加入文化與政治面向的範疇，記憶所繫之處是物質的、符號的，與特定歷史情境息息相關，為與政治權力共構的多重空間(Nora, 1989)。

「難解知識的策展」與「記憶所繫之處」連繫在於：容邵武（2011）根據 2002年 Kansteiner、2005年 Kuhn、1998年 Olick 和 Robbins 等研究，總結指出：記憶有別於真實存在的空間，若未外在化到一個（如文本、儀式、影像、建築物、紀念碑）的人為處所，將知識、感覺建構並轉化到我們未經歷的過去上，那麼記憶在社會的位置就不是那麼清楚。對《難解知識的策展》一書，「策展」正是將「記憶」外在化的手段，記憶透過策展再現於「記憶所繫之處」，將過去不堪、甚至仍隱隱作痛的感覺和經驗建構並轉化到觀眾未曾經歷的過去上。一旦，當策展主體與觀眾相遇，觀眾有所感知時，此凝視經驗將連接了過去、現在與未來。此時，當代博物館不再是靜態展示過去的殿堂，轉變成為既是「行動場域」，也為「記憶所繫之處」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當策展變成「實踐(praxis)」，並指涉「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生

成時，其終極關懷不再是「展什麼」，而是關乎「誰來命名」、「誰來展」。策展理所當然承載著意義與價值、象徵與慾望、認同與愛憎，儼然以文化載(主)體自居，關鍵更在於「誰」掌握了策展的權力，即握有文化、控制了被展示對象自我再現的工具³。借用 Barker (2004: 41)所言：「文化政治是關於事物與事件命名的權力，……可被理解為再現世界的的能力，並使特定描述成為『定型(stick)』的能力。在此，透過對未來社會秩序的重新思考、再描述，使得社會變遷成為可能」，此時的文化政治「已被設定成為了特定價值觀，經過一連串關於性別、族群、性慾與年齡等的社會集體鬥爭後，尋求當下社會的重新描述」。此正是《難解知識的策展》一書，在記憶、歷史與創傷；人權與良知；轉型正義與紀念博物館(memorial museum，以下簡稱紀念館)等多元面向背後的終極關懷（「如何透過策展使得社會變遷成為可能」），依 Barker 論述「公共空間裡的暴力過去」是辯證博物館及其公眾服務之間內在連繫的關鍵，透過策展面對過住霸權執意抹除的被禁錮知識，將折射出一道道微光，照見不願被遺忘的過去和記憶，帶來寬容的契機、和解的可能。

小結：揭露隱匿傷痛，有多困難？

初讀該書，反覆思索「公共空間裡的暴力過去」所指為何？當親訪《隔離之外的微光：我們為樂生創作》展覽時，頓然了解原來「公共空間裡的暴力過去」如此接近我們。誠如該展引言提及「若日本總督府帶來的『殖民現代性』是光，樂生療養院，就是被迫折射出的殖民地陰影；若『捷運』所象徵的便捷都市生活是光，樂生保留運動，就是都市化熱浪背後窮追不捨的暗影。若執政者塑造的歷史執意抹除這些過去，你我就是微光，一同照見這些不願被遺忘的回憶⁴」，宛若一道靈光，探照出《難解知識的策展》一書關乎

³ 本段文字原創概念，形塑自 2010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籌備會主辦的「返景入深林：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之「文化行動主義」子題 (<http://web.bp.ntu.edu.tw/WebUsers/taishe/>)，特此註記。

⁴ 請參考：青年樂生聯盟 (2013)「隔離之外的微光：我們為樂生創作」策展引言。
網址：<https://m.facebook.com/events/337051793105054> (瀏覽日期：2013 年 4 月 30 日)。

記憶、歷史與創傷、人權與良知、轉型正義與紀念館等當代重要社會議題。若同意前述「透過面對創傷歷史所產生的難解知識，不僅是建構的、辯證的，更是『情境中知識』」，以下有關 921 地震與災難、烏腳病與紀念館、Taipei 101 大樓與工鯨紀念碑之討論，或未能完整呈現臺灣相關難解知識及其策展的研究成果（也無意與《難解知識的策展》一書個案參照比較），旨在呈現「公共空間裡的暴力過去」原來無所不在，如此接近，讓讀者感受在地的「情境中『難解知識』」。況且「創傷歷史的情境」無法複製，特別是創傷經驗的對象不一，尚有族裔、性別、年齡與文化等諸差異，故「難解知識的策展」無法可循，關鍵在於：借助該書，如何形構臺灣在地「實踐取向的策展」之博物館意識與實作。

容邵武（2011：95）透過分析 921 地震後「九份二山國家地震 921 地震紀念園區」與「鹿神祭活動」兩個例子，旨在闡述「災難的重覆、災難論述的永恆回歸，是因為遺忘，社會記不起來、記不清楚，或更糟的是『被扭曲』的記憶，每次的敘說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情感，然而這些情感似乎總像是第一次面臨災難，沒有真正變成溝通，並且進而發揮行動上或學習上的效果」。陳雪雲等（2013：49）以位於臺南北門的臺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為案例，透過田野調查、烏腳病患口述歷史與館員、護理人員訪談等方法，由該館的展示分析、烏腳病歷史與記憶的再詮釋中，提出「死亡是每一個人最終宿命，烏腳病紀念館以展示醫療自居，除為觀者提供公共衛生資訊，或求生存策略，如避免身體受傷害，保持優質生活條件外，應能打破禁忌，以社會接受的原則，透過建築或展示，適度揭示死亡。雖然，猶如苦痛，死亡也是幽靈，但它們也是涵化民眾記憶良知的重要資產」等結論。

顧玉玲（2008：223）以「勞動者的血汗印記：工鯨紀念碑與歷史記憶」為題，介紹 Taipei 101 大樓緊臨信義路大門的七面交錯安置、各三米高二米寬的彩色琉璃牆所組成的紀念碑。此碑是為紀念 2002 年 331 大地震時，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陳錦水等工人的職災死亡，一年後，張達全在大樓電梯作業感電往生。然而，最後一塊琉璃碑背面，列出大樓土地

所有者台北市政府、承包營運的聯合財團、建造工程廠商、設計事務所、以及數個投注心力、參與建碑的工運團體。此紀念碑，固然是部份來自工運團體的長期努力，歷時5年、共40餘次討論會議，不免有許多的衝突、爭執、與妥協。從意象、選址、造型、色彩、材質、文案、命名、排列順序、資金來源...都是建碑必需面對的複雜歷程。但由於資方一再迴避工殤意象，最後勞工團體17主動要求把工殤紀念擴大為肯定所有的勞動者，列名所有參與大樓建設、設計約一萬多人，這樣，亡者的姓名列其中，也有了集體支撐的意義。由此引發「這樣一個分明是由出資者耗費鉅資，但又建基在基層工人的死亡代價上的碑，能夠給社會帶來什麼反思的意涵？這個碑，死人與活人並置。這個碑，犧牲與榮耀共存。這個碑，掌握政治與資本的人裝扮成伙伴洋洋名列第一排。這個碑，悲傷的眼淚包裝在七巧版的彩色琉璃下。一回頭就看見。紀念碑是糖衣？粉撲？遮羞布？還是暮鼓晨鐘？霧中燈塔？」等一連串的批判提問。

總之，有別於《難解知識的策展》國外個案的遙遠、難懂或事不關己，以上臺灣研究成果各具特色，或可探究「揭露隱匿傷痛，有多困難」，並具體而微呈現當下特定時空背景下「記憶所繫之處」的流動和變異，再次提醒我們原來「公共空間裡的暴力過去」如此接近，喚起筆者以野人獻曝的心情撰寫書評之初衷，忝為臺灣博物館學界拋磚引玉。

參考文獻

- Barker, C., 2004.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Ltd.
- Britzman, D., 2000. If the story cannot end: Deferred action, ambivalence, and difficult knowledge, *In: Simon, R. I. et al. (Eds.), 2000. Between Hope and Despair: Pedagogy and the Remembrance of Historical Trauma*, pp. 27-58,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Lather, P., 1986. Research as prax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6(3): 257-277.
- Morgan, C., 1983. Toward a more reflective social science. *In: Morgan, C. (Ed.), 1983. Beyond Method: Strategies for Social Research*, pp. 368-376. CA: Sage.
-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5.
- 江明親，2012。神聖場址與世俗記憶：殖民遺產的後殖民詮釋。林保堯主編。東方文化遺址保護聯盟臺北國際學術研討會：從南亞到臺灣－文化資產・歷史記憶・佛教藝術論文集，頁 533-557，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容邵武，2011。災難的永恆回歸：記憶政治與災難反覆的探討，*臺灣人類學刊*，9（2）：95-134。
- 陳雪雲、吳慎慎、陳仲彥、郭文耀，2013。重返歷史、人權與記憶－臺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的新未來。*博物館學季刊*，27（2）：31-53。
- 戴麗娟譯，Nora, P. 編，2012。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emoire)。臺北：行人。
- 顧玉玲，2008。勞動者的血汗印記：工殤紀念碑與歷史記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2：229-252。